

从错误知觉角度看中国印尼复交迟滞问题^①

朱陆氏, 周冠文

(湖南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中国和印尼关系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双边关系。然而历史上两国关系发展却并不顺利。苏哈托统治时期, 中印尼关系长期处于中断状态。即使在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纷纷与中国建交、复交的情况下, 印尼仍坚持不与中国复交, 其中原因非常复杂。文章从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的角度, 着重从历史包袱、诱发定势和认知相符这3个方面分析印尼对中国的错误知觉及其对印尼决定与中国复交的影响, 并就构建两国友好关系的心理基础提出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 中印尼关系; 复交迟滞; 错误知觉

中图分类号: D822. 3/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07)03-0025-07

一、问题的提出

1965年9月30日事件后, 印尼当局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参与了该事件, 两国关系从1965年的“北京—雅加达轴心”降到了冰点。1967年10月30日两国外交关系中断。进入20世纪70年代, 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改变, 美国开始调整其在亚洲的政策(当然包括东南亚), 逐步收缩在该地区的势力和影响。同时, 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 中国实行了较为灵活的外交政策, 取得了丰硕的外交成果: 1971年底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的席位;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 1972年9月,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 宣布中日正式建交。这些从整体上改善了中国与世界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日对华政策的转变, 给东南亚国家带来巨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 马来西亚(1974年5月31日)、菲律宾(1975年6月9日)、泰国(1975年7月1日)等东南亚国家先后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然而, 印尼作为东南亚大国却始终同中国处于外交关系断绝状态。20世纪80年代前后, 虽然

^① 收稿日期: 2007-03-26

作者简介: 朱陆氏(1968-), 男, 湖南汝城人, 湖南湘潭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副教授, 博士; 周冠文(1981-), 男, 安徽安庆人, 湖南湘潭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印尼总统苏哈托、副总统马立克和外长莫克塔尔多次宣称印尼政府为中印尼两国关系正常化做最后的准备,但总是没有实际行动。美国从其战略利益出发曾向印尼政府施压,要求其恢复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据报道,1975年底福特总统曾就中印尼关系正常化问题同苏哈托总统“交换过意见”;1979年美国试图再次逼迫印尼政府恢复同中国的外交关系。^{[1]129-131}但是,直到1985年7月两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才恢复了中断18年的直接贸易。1990年8月8日,两国才正式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经历了23年磨难的中印尼关系才得以恢复。

印尼政府在恢复两国关系上“似乎并不像中国那样渴望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也“并不屈服于美国对它的压力”,^{[1]129-131}“积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对于印尼政府的这种行为有各种解释。但从分析角度上来看主要是从客观和宏观方面来分析的。笔者认为印尼政府在处理印尼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之所以动作迟缓,主观和微观方面因素作用更加明显。甚至可以说,错误知觉起着决定性作用。正是由于印尼国内上下对中国的错误知觉加深了印尼对中国的忧虑,使得印尼国内对于复交问题迟疑不决。

二、错误知觉与中印尼复交迟滞

知觉(Perception)是一个精细加工和解释刺激信息,从而产生组织和意义的过程。^{[2]16}知觉不是由输入刺激直接给予的,而是当前存在的刺激与知觉者的某些内部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知觉既依赖于直接作用于感官的刺激物的特征,也依赖于感知的主体。知觉者一般的知识经验,他们对事物的态度及对活动的预先准备状态,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知觉的过程和结果。

根据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当人们接收到信息或者受到环境刺激因素的刺激时,就会产生对这一刺激因素的知觉,进而形成对整体的意象。人对感知的信息进行理解,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刺激因素做出反应。人们对于刺激因素的反应是根据自己对其的知觉,而不是根据刺激因素本身的性质。因此,如果知觉本身是错误的,那么由此产生的反应必然是错误的。

如果这种错误知觉发生在国际关系中,必然会影响决策,影响国家间的关系。由于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国际关系中发生错误知觉的可能性很大,而且这种错误知觉大多是夸大对方的敌意,将对方看成具有冲突意图的对手。根据杰维斯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历史包袱、诱发定势和认知相符3个错误知觉形成机制。^{[3]112-325}它们对错误知觉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中印尼复交问题上,这3个机制的作用使印尼对中国产生了错误知觉,而这些错误知觉最终又反过来影响了两国复交的进程。

(一) 历史包袱(Historical Burden)

人们往往将历史作为镜子,以史为鉴。历史可以教会人们许多东西,但历史也可以是沉重的包袱。“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却不会显而易见。”在甄别、提炼后,正确的知觉能让我们更好地将现实与历史对比,正确地认识现实。印尼人对中国的知觉主要来源于历史学习和对身边华人的了解。

一方面,历史学习是印尼人形成对中国整体知觉的主要途径。印尼历史教科书是这种知觉形成的载体,起着培养和塑造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历史教科书观点决定着国民的知觉。然而,印尼历史教科书中对中国的记述基本上都是负面的、错误的。它将汉武帝时期中国进入南满洲里、华南、华西南等地看成是扩张和殖民的野心^{[4]61},用描述欧洲殖民的词语来形容中国的统治,并给中国冠以殖民扩张的特征,甚至认为中国在寻求一种类似欧洲列强的对外殖民政策。^{[5]166}在描述元朝忽必烈远征爪哇等地时极力强调中国的侵略本性。而在对郑和航行到东南亚期间抓捕了包括巨港(Palmbang)国王在内的一些东南亚国王时极力向印尼人传递印尼是中国对外扩张政策受害者的

知觉。凡此种种,在印尼的历史教科书中屡见不鲜。

其实,中国印尼“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6]的交往中,友好关系是主流。在漫长的交往历史中,两国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内互通有无,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印尼的犁、制茶、丝绸、豆芽、豆腐等都是由中国传入的,而印尼的木棉、沉香、龙涎香、胡椒等也先后传入中国,促进了两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陶器、钱币等在印尼岛屿上有大量发现。其中在苏门答腊发掘的一件刻有铭文的陶器,其年代为公元前45年。唐代有不少佛僧先在印尼学习再往印度求经。高僧会宁在爪哇居留3年和中爪哇名僧苦那跋陀共译《阿笈摩》经两卷,为印尼和中国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这些都是当时中印尼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只有通过甄别的正确的历史观才能给人启示。错误的历史观必然会成为一种历史负担。作为印尼人认识中国,形成最初知觉的重要资源的印尼历史教科书却将这些“不用心读书的印尼人解读的中国”^{[5][165]}形象传递给广大印尼人,使他们从历史观上形成对中国的错误知觉。

另一方面,印尼的华人观是印尼人形成对中国知觉的最直接、最形象的途径。由于印尼人有关中国知识的缺乏,他们对中国的知觉大都是根据对国内华人的印象得出的。^{[7][165]}换句话说,印尼人对国内华人的知觉对于决定印尼对华态度与政策至关重要。

大多数印尼人认为华人群体很独立、很富有、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很自私。在殖民统治时期,作为“中间人”的华人同荷兰人一起压榨原住民,并积累了大量财富。到国家建设时期华人完全控制了印尼农村经济并在城市的各个商业领域发挥着强大的影响。^{[8]426-427}正是这种特殊地位使得华人总是认为原住民低其一等。而华人的自私主要是因为华人被认为对印尼革命目标冷漠并在支持印尼国家独立运动总发挥较小的作用。^{[9]115-138}华人在支持印尼从荷兰统治中独立出来态度模糊。许多华人倾向于骑墙观望并期望在动乱时期大发横财。在4年抗战时期,当印尼人不顾牺牲奋力抵抗荷兰殖民军队的时候,华人更关注的是如何保持自己优越的经济地位。^{[8]427}

其实,印尼华人对印尼的革命建设是做出巨大贡献的,是推动印尼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17世纪荷兰殖民者入侵印尼之后,华人和印尼人遭受到同样的命运,备受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并掀起一次又一次反抗殖民者的高潮。著名的“红溪事件”是华人用鲜血染红溪水反抗殖民的明证。在这次华人反荷起义中,华人和印尼人民联合斗争,多次痛击荷兰殖民者。尽管起义后来被镇压,但华人与印尼人民并肩反对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在中印尼人民友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八月革命中,广大华人紧紧地站在印尼人民一边,对印尼人民民族独立战争,从道义上、物质上给予了大力支持。不少华人还踊跃参战,为印尼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华人在印尼历史上的贡献不容抹煞。印尼人对华人知觉的这种选择性记忆和把华人对印尼的历史贡献从“印尼国家的集体记忆”中抹去^[10]的行为只能导致对华人的错误知觉,进而延伸到对整个中国国民的错误知觉,形成一种内心的排斥和鄙夷。

1969年11月,印尼外长马立克就提出印尼希望加强同中国的接触。^[11]1970年10月又派他的秘书跟中国接触探寻同中国复交的可能性。但是这种行为受到了国内各种力量的阻拦。“这些来自ABRI(印尼共和国武装力量)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强烈反对使……马立克深陷困境。”^[12]迫于国内的压力,马立克宣称没有必要急于(同中国)关系正常化。1975年11月,马立克坦承,“……这里不仅存在反共情绪,而且还有排华情绪,……我们需要时间去教育印尼人……”。^{[13]51}可见,在中印尼复交问题上印尼民众的作用不可忽视。

印尼国家军事学院的李德清(Lie Tek Tjeng)博士曾说过,“不应该忘记的是,中印尼关系正常化是一个极易诉诸民众的政治问题,这样的问题很可能被反对派有效利用以达到其攻击政府的目的。”^{[1]133}然而不幸的是,历史观上的和对国内华人的错误知觉这些历史包袱使印尼人对中国充满恐惧和鄙视,并进而产生一种排斥,反映在中印尼复交问题上就是复交迟滞。

(二) 诱发定势(Evoked Set)

人们接受到信息的时候会以自己当时集中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为定势, 据此解读自己接受到的信息。^{[3]14}在中印尼复交问题上, 印尼对任何有关中国的信息都从自己关注的问题出发考虑, 加上悲情的历史包袱, 导致总是从负面角度理解中国传递的信息。

苏哈托统治时期印尼主要关注和考虑的问题转移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上。在印尼政府看来对这 3 方面构成不利影响的主要有印尼共(PKI)、国内华人和中国威胁。

9.30 事件前, 印尼共就想利用自己的势力支持苏加诺总统建立第五支力量(Fifth Force)来逐步削弱军人集团对印尼政治的影响, 这对军人集团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事件发生后, 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军人集团政府利用手中掌握的“证据”^{[14]138-139}彻底捣毁了印尼共。但是印尼共作为一支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政治力量一直是印尼军人集团政府的心腹大患, 威胁着其政权的“合法性”。

由于印尼华人与印尼共、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 印尼国内华人一直是印尼政府关注的对象。一方面, 在印尼共被摧毁前, 印尼华人从经济上支持印尼共, 甚至是其成员。9.30 事件中“相当多的印尼华人卷入了印尼共 1965 年的暴乱”。^{[15]115-116}事件后, 印尼政府多次宣称国内华人暗地里从经济上支持甚至参加印尼共。在印尼政府看来, “反共必定排华(华人)”^{[16]65}另一方面, 在印尼国内华人群体被看作是印尼国内和国外威胁的桥梁。印尼社会普遍相信“印尼华人团体愿意充当中国在印尼从事颠覆活动的“第五纵队”(Fifth Column)。^{[17]108-109}正如陈鸿瑜先生在谈及马来西亚同中国建交时曾说的那样, “1974 年, 当马来西亚准备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 担心中国通过使馆影响马来西亚华人对国家的效忠, 成为马来西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主要考量因素之一。”^{[18]198}印尼人对国内华人的忠诚也充满疑虑。“驻雅加达的中国大使馆(复交后)会对印尼华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确保……中国大使馆……将不会动员 90 万中国公民及其他华人同情者在印尼从事反印尼政府活动”?^{[1]133}

历史包袱中中国威胁的忧患感在印尼当局怀疑中国介入 9.30 事件^①后总爆发。在印尼政府看来, 中国对印尼新政权充满敌意, 支持印尼共复兴并利用印尼华人干涉内政, 直接威胁到其新政府的执政之基。这种知觉在中国政府“左倾”外交政策的刺激下, 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19]中国政府任何一点毫无恶意的行动都会被扭曲、误解。^{[20]27}

加上这 3 个因素的交织作用和印尼政府为转移国内视线的有意煽动使这种联系变得弥足坚固。为了巩固政权的“合法性”, 印尼政府必须将印尼共复兴、国内华人和中国威胁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必然造成“反共必定排华(华人), 而排华一定要反华(中国)”^{[16]65}的后果。这种情况下, 中印尼复交问题也就失去了国内民众基础。

(三) 认知相符(Cognitive Consistency)

人们对世界的事物总是有着一定的认知, 这些人只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中形成了人在接收新的信息之前的原有认知。从心理学角度看, 人都有保持自己原有认知的趋向。当他们接收到新的信息的时候, 总是下意识地使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知保持一致。这就是所谓的认知相符。^{[3]13}

如果决策者接收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知不一致, 他们就可能对新的信息视而不见或曲解误断, 使能够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一致起来。当认知结构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 我们会感到十分惬意, 我们会很快地知觉事物, 记忆事物; 我们对新信息的解读也是以维持和加强这种平衡的方式进行的。^{[3]113}

在中印尼复交问题上, 苏哈托总统本人和印尼国内决策层表现出强烈的认知相符倾向。苏哈

① 据许多历史学家考证, 印尼指责中国卷入 9.30 事件纯属子虚乌有。详见梁英明:《印度尼西亚九·三〇”运动再审视》, 载梁志明主编《亚太研究论丛》(第一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托执政时期对印尼实行威权统治。苏哈托个人掌握着印尼所有的大权,有人甚至称他为“千岛国君王”^[21]。因此,苏哈托个人因素在处理中印尼复交上必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一方面,苏哈托个人成长和教育深受西方思想影响,对社会主义制度一直充满着敌意。而“一旦一个人产生了对他人的印象,尤其是产生了敌对印象,模棱两可甚至是前后矛盾的信息都会被纳入这种印象之中。人们知觉的只是与自己预期相吻合的东西。”^{[3]61}所以,苏哈托必然从内心深处敌视社会主义中国,不愿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另一方面,震撼性事件对决策者影响巨大,在这之后他们就会“像木头一样对正在接受的信息麻木不仁”。^{[22]48}对于苏哈托来说,“永远不会忘记”^{[23]117}的是9.30事件“杀死了他的同志”。^{[24]91}苏哈托在不止一个场合的讲话中提到他对中国的这段“痛苦经历”。^{[25]184}由此形成的认知相符使他对中国传递出来的友好信息视而不见或错误理解,错过了一次又一次推进两国复交的时机。1985年出席第三十次万隆会议纪念活动的中国外长吴学谦的约见,苏哈托视若不见就是明证。

在印尼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除了苏哈托总统外,还有军人集团、伊斯兰集团等势力。它们在中印尼复交问题上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不幸的是,这些势力都是强硬的反华派,对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仇视。“他们把中国认作是9.30政变的主要来源,由于他们控制着国家权力机构,他们坚决接受同北京关系正常化,其结果是中国—印尼关系的缓和得不到进展,而任由自由主义玩弄‘影子外交’。”^{[13]52}即使在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印尼军人集团对共产主义的中国仍固守其既有的知觉。他们不相信中印尼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后的中国会停止其在印尼的颠覆活动。^{[1]130}

杰维斯认为,“如果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对自己有敌意,即便是那个国家表现出其他人认为是中立或友好的行为,他们会无视或曲解这种行为,甚至认为是敌意的欺骗。”^{[3]61}这点可以从印尼军人集团的行为得到印证。1981年12月,经过数月筹划的印尼贸易代表团访华活动被迫取消,而随即却是台湾行政院长造访印尼。^{[26]971-972}更令人遗憾的是得到了苏哈托亲自会见,这无异于在中国的伤口上撒了把盐。^[27]中印尼外交关系正常化被搁浅。

“如果人们认为他们的伙伴并非故意伤害他们,那么他们的愤怒程度就会减轻,(即使报复,也不会严重。)无论他们实际受到的伤害有多么严重。反之,如果人们认为他们的伙伴是故意伤害自己,那么他们就会极端愤怒,(并进行强烈的报复。)无论他们实际受到的伤害有多轻。”^{[28]489}显然,由于认知相符机制的作用,印尼决策者都将中国视为故意伤害他们,所以必将强烈报复中国。阻挠两国复交就是一种手段。

三、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错误知觉的形成使得中国在印尼人的眼中成为“敌人意象”。根据理查德·赫尔曼和迈克尔·菲斯凯勒的认识意象理论,“敌人意象”是把其他国家视为威胁。^{[29]638}

既然印尼视中国为“敌人”,那么叫印尼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讨论与中国复交问题必然是不合适的,也是国内上下难以接受的。只有等到这种知觉和意象慢慢淡化甚至消失,才有商谈的心理基础。这个淡化的过程是缓慢的,但是一旦形成,想破坏的可能也较小。

正如杰维斯所言,“如果他者的形象一旦建立起来,就很难消除。”^{[3]37}因此,中国在今后与印尼的交往中要使印尼改善对中国的知觉和意象,从而建立两国关系的心理基础。一旦这种心理基础建立,其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时效是非常长久的。为了促进中印尼关系健康、稳定地发展,笔者认为中国应该主动采取措施尽力消除印尼对中国的错误知觉,进而从知觉的角度构建两国友好关系的心理基础。

首先,充分运用和拓展双方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个渠道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往来,增进互

信,扩大共识,深化友谊。比如,两国联手合作编写历史教科书,使得印尼历史书中关于中国的观点尽量公正。从历史认识上培养印尼人关于中国的正确知觉。

其次,中国政府应该劝告印尼华人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参与印尼国内建设,为印尼的发展献计献策,为中印尼关系健康发展做出贡献。^[30]使印尼人通过国内华人体会到中国人的友善,从日常的感性认识上改善对中国的知觉。

最后,中国利用自己的实力,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原则为印尼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以利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用实际行动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

笔者相信通过努力,中国印尼这两个亚太地区的大国一定能够甩掉历史包袱,摆脱诱发定势的影响,改变错误知觉,建立起牢固的友谊和稳定的关系。同时,我们也得承认中印尼复交迟滞是个复杂的问题,错误知觉角度只是提供解释该问题的一种方法,或许并不是完美的解答,但错误知觉对复交迟滞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参考文献:

- [1] SURVADINATA L. Chinese and Nation-Building in Southeast Asia[M].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1997.
- [2] DEMBER W N, WARM J S. Psychology of Perception[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9.
- [3] 杰维斯.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M]. 秦亚青,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 [4] FAIRBANK J K. China: A New History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5] TAYLOR C. Indonesian Views of China[J]. Asian Survey, 1963, 13(3).
- [6] PURCELL V.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7] SURVADINATA L. Pribumi Indonesians, the Chinese Minority, and China: A Study of Perception and Policies [M]. Kuala Lumpur: Heinemann, 1978.
- [8] AGUNG I A A G. Twenty years Indonesian Foreign Policy: 1945-1965 [M]. The Hague: Mouton, 1973.
- [9] SOMER-HEIDHUES M F. Citizenship and Identity: Ethnic Chinese and the Indonesian Revolution[A]. CUSHMAN J, GUNGWU W, et al.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C].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 [10] ADAM A W. the Chinese i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Indonesia Nation[J]. Kyoto Review of Southeast Asia, 2003 (3).
- [11] Djakarta Times, 1969- 11- 08.
- [12] Interview, 1995- 01- 11.
- [13] [新加坡] 黄朝翰. 中国与亚太地区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关系[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0.
- [14] CROUCH H. The Army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 [15] 曹云华. 东南亚的区域合作[M].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5.
- [16] 陈乔之. 冷战后东盟国家对华政策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17] FITZGERALD S.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J]. The China Quarterly, 1969(10-11).
- [18] 陈鸿瑜. 东南亚各国的政治与外交政策[M]. 台北: 渤海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92.
- [19] TAYLOR J.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Peking's Relations with Revolutionary Movements[M]. New York: Praeger, 1976.
- [20] VAN DER KROEF J M. The Sino-Indonesian Rupture[J]. The China Quarterly, 1968, 33(1-3).
- [21] 吴秀慧, 余金义. 苏哈托—千岛国君王[M]. 台北: 克宁出版社, 1995.
- [22] HAROLD, SPROUT M. An Ecological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Princeton: Princeton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68.
- [23] 苏哈托自述, 德威帕雅纳, 拉玛丹. 苏哈托自传——我的思想、言论和行动[M]. 居三元,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 [24] HEIN G. Suharto's Foreign Policy: Second Generation Nationalism in Indonesia[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1986.

- [25] SUKAMA R. Indonesia and China: The Politics of a Troubled Relationship[M] . London and New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1999.
- [26] BERT W. Chinese Policy towards Buma and Indonesia: A Post-Mao Perspective[J] . Asian Survey, 1985, 125(9) .
- [27] WILLIAMS M. China and Indonesia Make Up: Reflections on a Troubled Relationship[EB/ OL] . [http:// e-publishing. library. cornell. edu/ Dienst/ Repository/ 1. 0/](http://e-publishing.library.cornell.edu/Dienst/Repository/1.0/) .
- [28] NICKEL T. The Attribution of Intention as a Critical Factor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Frustration and Aggression[J]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74(42) .
- [29] 多尔蒂, 普法尔茨格拉夫.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 . 邵文光,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 [30] 人民日报, 1990-08-09.

[责任编辑: 邵 鸣]

Delayed Restoration of Sino-Indonesian Diplomatic Relations: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sperception

ZHU Lu-min, ZHOU Guan-we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y and Culture,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Hunan)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 is one of the vital bilateral relations in Asia-Pacific region. But in history it didn't developed smoothly. Under Suharto's rule, it had been keeping on suspension. While other nations were all building or restor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Asia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ndonesia still said no to that. The reasons are complicated. The article focuses on historical burden, evoked set and cognitive consist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gnitive psychology to analyze Indonesian misperception to China and the impact of this on Indonesia's decision to restore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of his own suggestions on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n which the two countries establish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m.

Key words: Sino-Indonesian relations, delayed restoration, misperception